

## 學術論文

# 一個中國的反思：舊歷史與新世界

---

## Rethinking of "One China" Principle: Old History and New World

蔡東杰 *Tung-Chieh Tsai*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兩岸關係發展史上，「一個中國」絕對是最關鍵且最敏感的一個概念性名詞，即便未來也恐怕不例外；無論是大陸與台灣彼此之間的文字往來，甚或在所有涉及兩岸關係的國際性活動、外交文書、法律性規範中，「一個中國」原則既到處可見，經常成為雙方爭議焦點，亦或許是最終能否解決此一長期紛爭的「繫鈴處」。儘管如此，究竟何謂「一個中國」？為何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到底應如何去看待「一個中國」的問題？「一個中國」的歷史與邏輯糾纏最終又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兩岸關係？在本文中，個人將試圖分析這一連串複雜難解的問題。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out a doubt, the term "One China" is the most critical and most sensitive term of all. Even in the future, exceptions will be hard to come by. Whether the case pertains to writte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r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diplomatic documents and leg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ubiquitous. While the concept often becomes the focus of feuds across the Strait, it may also be the critical link where 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ies. Nonetheless, what is “One China”?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One China issue? Ultimately, how will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One China influence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foregoing series of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questions.

---

**關鍵字：**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中國崛起、國家轉型

**Keywords :** One China,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a Rising, State Transformation



## 壹、帝國史的政治迴旋曲

所謂「一個中國」概念最普遍可見的常識性根源，或許來自《三國演義》第一回卷首所言，「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問題是，首先，這句話的關鍵字是「天下」而非「中國」，其次，在「天下」跟「中國」之間又有甚麼關係呢？

相較於今日所謂「中國」經常意指或等同於國家概念，在迄今多數歷史紀錄中，<sup>1</sup>則無論「天下」或「中國」都非如此。其中，「中國」所指的多為政治地緣中心（亦即中原）、政治中心（都城，因「中」字本即旗幟的象形，中國即王旗所在之處）、文化中心（相對於蠻夷）或歷史中心（正統代表），一方面既甚少直接用於指涉一個國家，更甚者，在近代「國家」（state or nation-state）觀念於十九世紀末被歐洲引進之前，「朝代」（dynasty）或許才是基本的政治單位。若真如此，那麼「天下」又是甚麼？

這就要從周的「封建體制」過渡到秦「帝國」談起了。

且不細論其背後繁複之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由西周所代表舊秩序之崩解既反映在封建單位彼此不斷相互兼併的事實上，<sup>2</sup>由於發生國際戰爭的頻率在春秋時期後大幅提高，一方面驅使單位間關係不斷朝向「實質化」發展（相較於原先僅具儀式性），正如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

<sup>1</sup> 目前可知「中國」一詞最早的使用紀錄，出現在西周成王時期（約西元前十一世紀）記載其營建東都成周史實的青銅器「何尊」銘文當中：「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

<sup>2</sup> 由於上古史料殘缺，相關描述實無法取得共識。例如錢穆在《國史大綱》書中提到：「見於春秋國數凡五十餘，若並見左傳者計之，有百七十國」，其註解又引顧棟高所著《春秋大事記》指出，在兼併過程中「楚併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也可作為參考。另根據《呂氏春秋·觀世篇》所載：「周王所封四百餘國，服國八百餘」，但迨至春秋初期，能見於經傳者只賸 160 餘個政治單位；到了戰國時代，如同《史記·周本紀》所言：「...諸侯彊併弱，齊楚秦晉始大」，其中齊併國三十五，楚併國三十六，晉併國二十，可見當時兼併戰爭之激烈程度。

stability) 所暗示的，在周王威望衰退帶來的霸權真空狀態中，「準霸權」者亦經常試圖取代其角色，透過「會盟」(召開國際會議)途徑來排解糾紛，並藉此獲取較高的影響力。<sup>3</sup>值得注意的，隨著各政治單位紛紛針對稅收、人事行政、法律制度、軍事動員與經濟政策等方面進行徹底變革，雖加強了統治者的政治領導力，也鼓勵並誘使國家繼續投入惡性競爭(戰爭)循環當中，結果在戰爭型態與目標方面，乃逐步從西周體系時期的「儀式性威望戰爭」(目的在確認周王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與春秋時期的「威望性有限戰爭」(戰爭激烈度增加，但主要仍在取得對他國的影響力與控制權)，升高到戰國時期普遍可見的「兼併性總體戰爭」(投入戰爭的動員規模更大，且最終目的在吞併戰爭對象)；最後，不僅西周時期所代表的舊秩序蕩然無存，或許正因為由此所導致對秩序更終極性的渴求，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架構，新的「統一帝國」(unification empire)結構亦藉此油然而生。<sup>4</sup>

進一步來說，由秦在西元前 221 年藉由統一六國所創造的新時代，不僅對中國而言，對整個東亞地區也具有關鍵性的歷史意義。

相較於主要侷限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的西周，體系範圍經由從春秋到戰國時期的不斷擴張後，至戰國末期已逐步往北推進至目前長城沿線，東北部抵達遼東半島附近，南部涵蓋了整個長江流域，西邊則靠近河西走廊入口，這也是未來此處數度重建帝國的地理基礎，一般也被泛稱為「中國本部」(China Proper)。<sup>5</sup>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帝國結構所擁有更大的投射能量，其

<sup>3</sup> 當時的會議未必都由霸權國家召開，例如兩次「弭兵之盟」便是；第一次是由宋國大夫華元在西元前 579 年拉攏晉與楚暫停敵對狀態，第二次則同樣由宋國大夫向戌在西元前 546 年拉攏 14 國與會，但成效均不大。一般認為，北杏之會僅是齊爭霸的開端，但桓公的盟主地位此時並未得到公認；為真正鞏固霸主地位，齊桓公又在西元前 679 年與宋、陳、衛、鄭等諸侯會盟於鄆，因為此次會盟由桓公獨自召集，足見其號令諸侯的影響力，桓公自此也以「尊王攘夷」做為政治號召。例如《史記·齊太公世家》便指出：「七年，諸侯會桓公於鄆，桓公於是始霸焉。」

<sup>4</sup> 蔡東杰，《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台北：五南，2013 年)，頁 18。

<sup>5</sup> 相關概念其實源自西方學界觀點，但最初使用的時間已難予考證。Harry Harding 認為，該

後包括從朝鮮半島到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從內蒙古草原直抵中亞、青康藏高原邊緣地帶、由珠江流域沿伸至中南半島北端等地，也因自此與「中國本部」維持著長期且密切的聯繫互動，以致成為「中國中心體系」（或東亞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比起西周時期，整個體系範圍擴張了至少十倍以上。

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或許是所謂「中國本部」既擁有進可攻、退可守之天然疆界的地理現實（東為太平洋濱、北為戈壁沙漠南緣、西則為從喀米爾到雲貴的高原連續線），地緣中心所涵蓋的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又提供了巨大的經濟累積能量，由此，一方面在穩定的空間邊界（狹義為中國本部，廣義則指以中國為中心的大東亞體系）下，形成了所謂「天下」的集體地理記憶基礎，其次，正如秦國「統一天下」所暗示的，孟子在戰國初期所指天下必須「定於一」才能終結戰禍（亦即獲致最終的穩定秩序）的說法，<sup>6</sup>不僅相當自然，也指出了未來無可避免的政治發展方向。換言之，由秦始皇建立的「帝國」架構與西周「封建」體系實則形異而質同，也就是都試圖藉由「層級性」（hierarchical）構造來確保威望在形式上的「集中化」；<sup>7</sup>當然，沒有任何制度可以永恆地被適切運作（直接反映於王朝更迭的過程中），但不斷地努力在相對固定空間中去重建秩序（帝國）的過程及其結果，仍舊極其自然地刻劃下前述「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集體歷史記憶。

---

名詞早在 1827 年便已經存在，但也有另一些人指出，英國學者 William Winterbotham 在 1795 年所著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書中便提出過「China Proper」的概念。

<sup>6</sup> 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孟子見梁襄王，出與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之。』」

<sup>7</sup> 在西周體系中，只有周國統治者可稱「王」便是一個例證，至於在戰國時代後，由於各國紛紛稱王，既凸顯出周王威望減損，也暗示整個體系朝平行性結構邁進。為重建前述層級性秩序，秦在統一六國後自稱「皇帝」，不啻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在此後的兩千餘年間，在東亞體系中也唯有居於核心的統治者（未必只有中國）才能稱帝，並作為國際秩序存在的某種象徵。

正是在前述集體地理與歷史記憶的共同形塑下，介乎於政治單位與文化實體之間的「中國」也若隱若現地持續存在著。

## 貳、現代國家的建構與挑戰

前述以「中國本部」為地理空間基礎，所形成以「朝代」為主要政治認同對象，然後以「中國中心」(China-centric)為主的集體記憶與歷史觀，儘管兩度遭遇重大挑戰（蒙古南下與滿清入關），但因前者時間有限，後者則存在一定「自我漢化」政策，最終並未能顛覆兩千年來的傳統想像。無論如何，面對西方力量在十九世紀帶動全球化所致的新壓力，所謂「中國」既被迫面臨了「從天下到成為國家」的轉型過程，<sup>8</sup>其本身也逐步從具體體系結構概念之天下中心，最終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名字。<sup>9</sup>

當然，整個故事還是得從歐洲說起。

包括地理發現後大西洋貿易（Atlantic trade）所帶來之持續收益，<sup>10</sup>荷蘭奠下之各種現代經濟制度（包括金融體系與股票交易）雛型、英國在生產技術上的重要突破（蒸汽機工業革命），以及法國透過 1789 年大革命給了「舊體制」（Ancien Régime）致命打擊等，這一連串歷史進程都讓西歐有了脫胎換骨的發展；尤其在經濟表現方面，以全球製造業產能比率為

---

<sup>8</sup>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s: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Immanuel C.Y. Hsu,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up>9</sup> 葛兆光在《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書中曾討論了若干普遍性概念，可供參考。

<sup>10</sup> 大西洋貿易是指十六到十九世紀時期，在環大西洋地區，透過將非洲人民作為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美洲殖民地的一種貿易過程。在長達 400 年的黑奴貿易中，估計從非洲運到美洲的奴隸約為 1200-3000 萬人左右。至於其與歐洲的關係也被描述成一種三角貿易，它是指先將販奴船載着「交換」奴隸用的槍枝彈藥和廉價消費品，從歐洲港口航行到西非海岸，在此地交換大批奴隸後，再橫渡大西洋駛往美洲，最後則將美洲用奴隸獲取的原料和金銀運回歐洲。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 6 個月，獲利率約 100-1000%，由此一方面為歐洲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也為工業革命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例，相對於中國在 1830 年左右仍占有 29.8%，逐漸於西歐獨占鰲頭的英國則僅有 9.5%，到了英法聯軍後的 1860 年則雙方已拉成平手（約 19%），甚至英國在 1880 年便以 22.9% 的比例遠超過中國的 12.5%。<sup>11</sup>進一步來說，繼十三世紀蒙古西征打通歐亞大陸通道，從而帶來近代第一次的「世界擴張效應」(enlarging effect)後，透過十六到十七世紀之間的大規模海上活動，其結果一方面使歐洲人對於地球表面的認識比例從 1500 年的 22%，1600 年的 49%，一路激增至 1700 年的 61%，最終奠定了今日「世界＝全球」的新地理概念基礎，這也是在人類歷史上首度將所謂世界範圍涵蓋了整個地球表面的壯舉。

更為關鍵地，就像 Charles Tilly 指出的，歐洲在 1400 年以前的世襲主義時期中，如同世界上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在內）一般，統治者都是透過稅收與貢賦來獲得財政收入，沒有任何單位存在現代意義的預算制度，<sup>12</sup>但隨著兼併戰爭日趨頻繁，政府既被迫進行更密集的資源收集活動，為保證籌措到足夠資源，並獲得人民支持以維繫政權存續，必要且更積極的精神動員活動不可或缺，此即近代民族主義 (modern nationalism) 的起源，<sup>13</sup>其主要目的在強化我者 (we group) 與他者 (the other) 的區隔，建立起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框架之基本出發點，並透過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等後設性概念，<sup>14</sup>突出前述區隔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必然性，然

<sup>11</sup> 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2。

<sup>12</sup>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pp. 74-75.

<sup>13</sup> Edward Mortimer and Robert Fine, *People, Nation, and State: The Meaning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John Hall, "Nationalism: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in Sukumar Perival ed., *Notions of Nationalis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15;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14</sup> 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英國學者 Charles Darwin 提出之「進化論」(Theories of Evolution) 中的「物競天擇」概念，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理論；最早提出相關概念的是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 Herbert Spencer，至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學者 Richard Hofstadter 於 1944 年出版的書中。Thomas C. Leonard, "Origins of the myth of social

後藉由賦予政府擴權更高的正當性基礎，據此形塑出「強國家－弱社會」（例如王權至上或強化權威統治等中央集權機制）趨勢的政治發展軌跡。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政治單位在十八到十九世紀之交歷經的「大轉型」，其實結果可再細分為「軟國家」（soft state）和「硬國家」（hard state）兩個同時並存的特質：其中，前者指的是完成「精神面統一」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後者是完成「法理面統一」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至於其目標則是共同組建一個能量極大化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然後如 Arnold J. Toynbee 所揭櫫的「挑戰－回應」歷史演進模式一般，藉此幫助各個單位回應衝突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

就目的論來說，無論是自強、維新，乃至於立憲與革命運動，中國起自十九世紀末的種種變革又何嘗不是如此？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便曾如此形容，「現代國家在中國產生，是革命與變革的結果，並受到了外部世界種種力量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關鍵，在於借助外部是利用以獲得物質及社會主導地位各種手段，要完成此一宏大事業，似乎便須動員人民的力量，重寫政治競爭的規則，並加強國家對於社會及經濟的控制。」<sup>15</sup>差異在於，相較於歐洲制度演化過程中較多的「內生性」比例，近代中國則無法避免存在更多的學習與模仿，甚至是來自西方所進行「制度同化」（institutional assimilation）之外部壓力；<sup>16</sup>其結果是，中國（甚至包括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內）在制度轉型過程當中，難免將出現一些與現實脫鉤的難解現象。

例如，在邁向現代國家當中，中國既必須完成史上首度建構「民族」和

---

Darwinism: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s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71 (2009), pp.37-51.

<sup>15</sup> 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5。

<sup>16</sup> 西方對中國（當然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區）的制度同化乃是個漫長且持續的過程，無論是十九世紀末企圖將清朝拉進條約體系（treaty system）的作為，乃至於1980-9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peaceful transformation）或介入（engagement）政策等，基本上都是企圖透過制度同質化以達到降低談判「交易成本」的效果。



「主權」的過程，又由於這兩個概念都具有明顯的「單一性」（前者強調由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後者則堅持獨立行使與不可分享的特質），致使中國由體系核心轉化為國家名稱之餘，也強化並落實了其單數取向，這便是「一個中國」或為何中國只能有「一個」的概念與制度起源。問題是，歐洲在發展現代民族與主權觀念同時，往往能大體保障結構上的「形式統一」狀態，但在中國，由於清朝崩解後陷入長期內戰以致出現「主權分裂」或者「單一代表性不確定」等狀況，<sup>17</sup>既始終受到忽視（許多第三世界「新興國家」也是如此），為單方面追求行動正當性起見，歐洲國家亦往往基於「便宜行事」原則，主觀選定「在國際法規範下，可代表簽約的談判對象」，<sup>18</sup>以便維護其既得利益，根本無視於中國其實尚未滿足作為「國際法下的國家」（stat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之充要條件，當然，其可能後遺症（激化或延長內戰，以及帶來分裂國家與主權競賽等國際政治現象）也不在歐洲的關切範圍內。

### 參、站在後現代國家的前沿

在前面兩個段落中，個人嘗試從中國與歐洲的歷史脈絡中，一方面整理其歷史傳統的基礎，同時亦設法發掘它們向「現代性」（modernity）轉型的因果，當然也包涵了其後遺症與挑戰在內。無論如何，歷史既不可能停止演進，人類社會的制度發展事實上也不可能出現具「終結性的歷史選擇」；<sup>19</sup>史實昭昭在目，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主流在過去三百年間既陸續從

<sup>17</sup> 例如 1917-27 年的北京政權與廣州政權，1927-28 年的南京政權與武漢政權，1940-45 年的重慶政權與南京政權，當然也包括 1949 年後北京的政權與台北政權；這還不包括眾多各行其是的獨立割據軍閥。

<sup>18</sup> 此種主權問題可以蘇聯的舉動為例；在 1917 年革命後，為保障舊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既得利益，蘇聯一方面在 1924 年與國際公認的主權代表（北京直系政府）簽訂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但同時也和實際控制東北的奉系地方政府簽訂了「奉俄協定」，甚至為求保險，還邀請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簽署「孫越宣言」。

<sup>19</sup>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Vol.16

十八世紀的法式開明專制、十九世紀英式君主立憲，一路走到今日的美式選舉民主，政治主體也從神授君主、民族國家，走到如今的人民主權階段。

倘若站在今日能一目瞭然過去的蜿蜒曲折，那麼，明天又如何？

且不論近代中國在「半自願、半威迫」地引入西方主流觀念與制度後，為自身歷史所帶來之「千古一大變局」與種種問題，回到這些制度本身，它們又何嘗百年如一日般的屹立不搖？對現代國家來說，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挑戰，或許來自個人所謂的「後民族主義症候群」(post-nationalistic syndrome)。

正如眾所周知，且不論「民族」或許不過是個被有意刻劃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sup>20</sup>事實是，民族主義這個自十九世紀以來仍引領風騷的意識形態，目前正受到兩股力量的夾擊：首先，由於個人主義興起與社會多元化影響，以及利己主義團體日益風行，傳統民族與國家認同在二十世紀末似乎在部分地區出現明顯的消蝕現象，<sup>21</sup>其次，隨著傳統的國家間衝突 (inter-state conflicts) 爆發頻率自冷戰時期起便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尤其自 1990 年代以來，國內性族群衝突則明顯成為國際社會新的關注焦點，<sup>22</sup>

---

(Summer 1989) 文中首度提出「歷史終結」命題後，又出版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一書，對前述命題展開更詳細的論述，主張西方自由民主在制度演進上的最高價值，隨即在學界引發廣泛批評和論爭。但福山自稱前述觀點並非由他創造，而是源自 Hegel 和 Marx，目的乃希望理解現代化過程的最終發展，並在 “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Open Democracy* (May 2, 2006) 文中自辯；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y-fukuyama/revisited\\_3496.jsp](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y-fukuyama/revisited_3496.jsp)

<sup>20</sup> 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sup>21</sup>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139; Eric J. Hobsbawm,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London: ABACUS, 2008), chapter 5.

<sup>22</sup> Ray Taras and Rajat Ganguly,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New York: Longman, 2002); Michael Brow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Ethnic Conflict,” in Michael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 Ulrich Schneckener and Stefan Wolff, eds., *Managing and Settling Ethnic Conflicts* (London: C Hurst & Co., 2004);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in Michael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進言之，大多數國內性紛爭既與族群糾葛分不開關係（包括分離主義運動、內戰中的大規模種族清洗，或單純族群對立），其根源亦幾乎都來自對現代民族國家所建構之「大民族」（或泛民族）意識形態的反彈。<sup>23</sup>

進一步來說，不僅由於無法從科學面精確定義族群邊界，加上族群政策中自然較偏向優勢多數族群的政治結果，經常導致前述反噬性發展，起自 1950 年代的歐洲整合運動無疑更具象徵性意義：作為現代政治民族主義發源地，儘管整合未必與主權存在零和關係，<sup>24</sup>歐盟也始終陷於「無法徹底成為國家，但也不是個單純的國際組織」之困境中，<sup>25</sup>某種跨國區域主義（trans-national regionalism）仍部分且逐步取代民族主義，成為政治動員之新認同中心角色。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現代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僅來自精神面而已，在法理面也不遑多讓。以十六世紀末才成為政治思想主題的主權觀念為例，<sup>26</sup>儘管時至今日已形成「在一片土地上只能存在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政府，...對內意味著對居住在特定領域內的人們擁有最高權威，...對外則意味著相較於其他統治權威之獨立性」的國際規範，<sup>27</sup>然而，「經過若干時日後，主權原則在知識上看似一致之合理性仍逐漸地走向衰落」，<sup>28</sup>Zbigniew Brzezinski 早在 1970 年便指出，作為國際政治舊框架核心

---

Press, 1993), pp.28-9.

<sup>23</sup> Luis Snyder, *Macro-Nationalism: A History of the Pan-Movement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4);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Pan-Nationalist,"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7/31/opinion/sunday/the-rise-of-the-macro-nationalists.html>

<sup>24</sup> Alan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92);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25</sup> 遠藤乾，《歐洲統合史》（台北：五南，2010 年），頁 396。

<sup>26</sup>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39-40.

<sup>27</sup> Robert Jackson,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1999), p.433.

<sup>28</sup> Joseph Camilleri and Jim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New Yor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2), chapter 9. See also Thomas

之主權觀念，其虛構性早已與現實不相符合。<sup>29</sup>

更甚者，主權主要的捍衛對象（國家）可說正同時遭逢著來自內外兩個方向的夾擊：在內部方面，不僅現代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背景，原即來自國家試圖拉高人民對其反饋之需求所致（亦即透過此類精神動員，增加人民對多餘負擔的忍受度），在國際競爭始終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國家既無法撤回此動員正當性，人民也不可能猶如無底洞般任由國家（政府）需索，最終導致主權主體由國家向人民轉移（也就是以人民主權取代國家主權）；至於在外部方面，則是由於跨國合作日益頻繁，但又因為一定程度之「主權讓渡」（sovereign transition）乃國家加入各類國際建制的必要條件之一，隨著此類國際互動活動愈來愈多，其所導致之主權減損現象自然也愈發模糊可見。

其次，正如 Chris Brown 進一步指出的，「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最大的變化之一，無疑是個人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逐步崛起」；<sup>30</sup>由此，人權（human rights）既成為愈來愈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sup>31</sup>相較於個人地位的突出，作為傳統單位的國家的作用與影響力自然受到一定擠壓，至於其結果之一則不啻是所謂「後現代國家」的隱約浮現。根據 Robert Cooper 的定義，<sup>32</sup>後現代國家將比現代國家「更多元化、複雜且更具分權特質」，同時在全球

---

W. Mcshan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Redefining Sovereignty," in J. Boone Bartholomees ed., *Guide to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8), pp.31-49.

<sup>29</sup> Zbigniew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otronic E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see also "The Dilemma of the Last Sovereign," *The American Interest*, September 1, 2005,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05/09/01/the-dilemma-of-the-last-sovereign/>

<sup>30</sup> Chris Brown,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2), p.216.

<sup>31</sup> Peter Baehr, *The Role of Human Rights in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94); Richard Claude and Burns Wetson eds.,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David Forsythe,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32</sup> Robert Coo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Demos, 2000), p.31.

化浪潮的環境背景下，國內與外交事務的界線也將更難切割。當然，站在實事求是的研究角度，此處不可能違背現實地去過度放大傳統民族主權國家在「存在」與「規範」面所受的挑戰，但相反地，若無視於這一連串新發展，執拗地想像某種「典範長存」狀態，或許也是脫離現實且危險的。

#### 肆、一個中國與兩岸關係

無論人們試圖解決當下何種問題，依託可見之歷史經驗，並遵循既存之指導性規範，乃是最常見的思考捷徑；值得注意的是，歷史既很難一成不變，也往往在人們不經意時來個大轉彎。

這也是我們面對當前兩岸關係時最大的挑戰所在。

正如自視處於天朝盛世的中國，無法察覺出 1792 年 George Macartney 使團之象徵意涵及其所暗示東西方「軸線翻轉」的現實一般，在整個十九世紀臻於全球影響力巔峰的歐洲，也很難想像出 Norman Davies 所指出，籠罩著二十世紀歐洲之一股「野蠻陰影」（意指隨後爆發的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以及在該世紀下半葉所瀰漫「歐洲已不再重要」的普遍心理感受。<sup>33</sup> 其結果是「十九世紀時的幾個主要強權，如英國、法國、德國，如今只有當它們願意將自身利益共同彙聚在一個整體性的歐洲共同市場上時，才有資格稱得上是強權」；<sup>34</sup> 至於取而代之的則是法國思想家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 1835 年鴉片戰爭陰霾逐漸籠罩在中國頭上時所提出，其後在冷戰時期神奇應驗的預言，「現時世界上有兩個偉大民族，...我指的是俄國人與美國人，兩者都神不知鬼不覺地成長起來，並在人類將注意力放在別處時，突然躋身到了各國的前列。...所有其他民族，彷彿都已達到它們

<sup>33</sup> Norman Davies 著，郭方等譯，《歐洲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920, 1091。

<sup>34</sup> Philip Lee Ralph 等著，文從蘇等譯，《世界文明史後篇：從工業革命到現代》（台北：五南，2009 年），頁 340。

的天然極限，...但這兩個民族卻仍然在生長。」<sup>35</sup>

無論如何，美蘇崛起的歷史意義恐怕不僅於此。

美國和蘇聯在二十世紀中葉成為歐洲霸權的繼承者，或許並非只是一種時間上的巧合。事實上，如同 Thomas S. Kuhn 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概念一般，他企圖說明的是，科學（或觀念）演進的過程並非經由演化，而是透過革命（全新的創意和思考邏輯）來推動的，簡言之，典範轉移指的是人類的習慣改變、觀念突破與價值觀的遞移；<sup>36</sup>從某個角度看來，美蘇在制度上與十九世紀歐洲明顯有異的獨特性，正代表著此種轉移過程。

首先，無論是美式的選舉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y)，或者是蘇聯的民主集中制 (democratic centralism)，且不管它們跟民主本身的關聯糾葛，如同個人在前一段落中所述，相較於歐洲更重視上層建築的國家中心觀，它們都充分彰顯了將主權本體從「國家」移往「人民」的新趨勢，並設法各自尋求在制度面落實的不同途徑。其次，無論是強調聯邦制 (federation) 與融爐 (melting pot) 概念的美國，或擁有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之特殊設計並強調世界革命 (world revolution) 的蘇聯，很明顯地，它們既有別於歐洲式民族國家，也都指出了政治發展上的後民族主義傾向。當然，今日蘇聯已然瓦解，美國亦未必能繼續執制度主流牛耳，但參照前一個段落所提及國際政治演進之蛛絲馬跡，或許仍可看出未來某種隱約可見之線性方向。

正所謂「開弓沒有回頭箭」，人類歷史發展也總是不斷向前，難有後退的可能；豈不見所謂「復古」，經常也不過是「託古改制」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對中國而言，面對當前全球化下新的開放性地緣環境，想重回或複製

---

<sup>35</sup>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2000), p.168.

<sup>36</sup>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96.

過去以相對孤立完整之東亞大陸空間作為政治地理基礎，然後據此重建帝國架構的歷史路徑，顯然既不可能，也絕對不理性；至於對歐洲來說，儘管依舊處於現在進行式狀態，甚至近年來包括金融海嘯下之債務危機衝擊，與極右勢力在某些地區的興起等，<sup>37</sup>都為其區域整合之未來埋下不少隱憂，但如同各國在 1648 年建立西發里亞體系時擁有的普遍共識般，歐洲邁向「後西發里亞框架」(Post-Westphalia Framework) 或許也存在毫無懸念的可能性。<sup>38</sup>據此，由傳統西發里亞體系核心概念(主權與民族主義)所支撐的「一個中國」，固然迄今還是一個便捷可用且具相當說服力的政策工具，仍舊可能在其失去正當性來源後，反而成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之負累。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選擇面對未來的因應道路呢？

個人認為，橫陳於兩岸面前的是三個選項：首先是有如百餘年前的清末遺老一般，缺乏體認現實的反應力，只能作為歷史共業的承擔者以及將逝傳統的盲目追隨者；其次，則是努力與時俱進、亦步亦趨地與潮流共同前進；最後，也是具有最高自我期許的，則是透過回顧歷史設法展望未來，然後更積極地去擔任潮流的引領者。

進一步來說，或許重點並非只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已，而是應思考兩岸該共同在未來構建「一個甚麼樣的中國」，這個新的「中國」又可能對人類的下一階段發揮甚麼樣的作用。換言之，與其老是沉緬過去，還

<sup>37</sup> Marcel Lubbers, Merove Gijsberts, and Peer Scheepers,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1 (2002), pp.345-378; Elinadav Heymann, "Sudden Rise of Far Right Groups in EU Parliament Rings Alarm Bells Across Europe," *The World Post*, June 19,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linadav-heyman/sudden-rise-of-far-right-\\_b\\_5512961.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linadav-heyman/sudden-rise-of-far-right-_b_5512961.html)

<sup>38</sup> Edward Newman, "Fail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nstructing a Post-Westphalian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30, No.3 (2009), pp.421-443; Gordon Anderso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 and the Quest for Self-determin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24, No.4 (2007), p.3; Jose Manuel Pureza, "Toward a Post-Westphalian Internationalism,"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2-04-26-pureza-en.html>

不如更正面地追求未來，或許這才是所謂「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的真正價值吧。

